



西南政法大学

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

·己巳·

全球化背景下私法的冲突、协调和统一

——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集

The Conflict, Coordination and Unity of Private Law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 Essay Collection of Private Law and Comparison



西南政法大学

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全球化背景下私法的冲突 协调和统一

——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私法的冲突、协调和统一:国际私法
与比较法论集 / 徐国建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8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

ISBN 978 - 7 - 5118 - 1025 - 0

I. ①全… II. ①徐… III. ①国际私法—文集②比较
法学—文集 IV. ①D997 - 53②D90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7987 号

西南政法大学
学子文库

全球化背景下私法的冲突、
协调和统一
——国际私法与比较法论集

徐国建 著

责任编辑 易明群 董 飞

装帧设计  iloovee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30.25 字数 419 千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025 - 0

定价:4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

总 序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动。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这六十部作品,是我校学术实力的又一次整体亮相,也是对我校新近学术成就的一次盘点。她既是法学名家和新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历史见证,也承载着西政校友回报母校、奖携后学的温热期许。尤其是,鉴于西政目前已由法学单科性院校转向为“以法学为主多学科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因此就学术成果展示而言,今年校庆较之以往的校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学科成果多元化,而不再仅限于原来法学单科性院校视阈中的学术成果之展示。

这六十部作品,刻录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西南法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发出的一种声音、沉淀的一种思考,与时人共鸣,更让后人知晓并体悟一代又一代西政人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负责地思考过什么、呼吁过什么。这是西南政法大学为建校六十周年所提交的一份学术答卷,也是西政人为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献上的累累教研果实和片片赤诚之心!

我们真切地期待着学术界对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进行庄重批阅,更真切地期盼当下和未来的读者们细细品味、神思交游,一同探索、领悟中国法学教育、中国法治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正道!

西南毓秀,桃李芬芳。

西南政法大学一直被誉为“中国政法界的黄埔军校”。其学术成就和人才群体,是新中国法学教育、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西南政法大学原名西南政法学院,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由刘伯承元帅担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革大”的爱国情怀是西政精神的源头。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正式挂牌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建院伊始,学校得到了时任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西南政法学院首任院长。西南政法学院建院之初即选择歌乐山下红岩烈士殉难之所作为校址,更是为着“以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政法干部”。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西政。特殊的建校背景,使我校既会聚了法学名流又吸纳了实务精英,既秉承了深厚的法学传统又融入了公安教学的特色。学校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

“西南联大”。

学校先后经历了由西南大区、司法部、四川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重庆市等多次管理隶属关系的变更。回首往昔,“文革”期间曾一度被迫停办,1977年经中央批准率先恢复招生。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司法部部属政法院校中唯一的重点大学。1995年,学校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2000年,由司法部直属划转重庆市人民政府管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2008年,成为教育部和重庆市重点建设高校。

六十年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六十年来,创业的艰辛、曲折的磨难、探索的迷惑,起伏跌宕;

六十年来,从化龙桥、歌乐山披荆斩棘到渝北校区破土拓荒,从复办的艰苦卓绝到三次创业的宏图大展,几代西政人薪火相继,矢志前行,一次次成就骄人的辉煌,共同书写了中国法学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六十年来,西南政法大学发展中的每一个点滴和大小时刻,凝聚、塑造了独特的西政学人风格与学术品格;

六十年来,变化的是历史,不变的是精神。

——心系天下的责任意识。《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西政人对国家、对社会始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巍巍歌乐山,激发了西政人昂扬的浩然正气;泱泱嘉陵水,滋养了西政人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或悉心研究,探求法魂,传播法义;或积极践履,敢为人先,奔走在法治实践的第一线;或运送正义,为社会进步鼓与呼。在众多的西政校友中,既有偏居基层或边远地区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法律工作者,也有为人类和平民众平安勇于献身的时代英烈。在诸多历史关头,西政人总是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西政人爱校如家,对学校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凝聚力常令他人感叹不已。西政发展曾屡遭磨难,“文革”期间更是一度停办,但老一辈西政人奔走呼号,反对撤校,为保留西政家园而不屈斗争终获胜利,为后来的“西政现象”奠定了基础。六十年来,西政人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挺过无数难关,熔铸了西政品牌。当学校遇到波折或困难时,西政学子总是发出“天佑西政,生生不息”的共同

呼声。心系天下又爱校如家,这种家国情怀是西政人奉献国家社会的动力源泉,也是学校发展的宝贵财富。

——**自强不息的克艰气魄。**西政的发展历程,是一部百折不回、逆境崛起的拓荒史,也是一部披荆斩棘、克服万难的励志片。初创时期,在荒山野地上建校,西政人以拓荒者的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十年浩劫,学校面临灭顶之灾,险被撤销,西政人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率先复办的先机,并成为全国重点大学。刚从“牛棚”中返归讲坛的老师们,怀着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学术虔诚,将压抑了十多年的激情转化为传道授业的热心,学生们则为了弥补失去的青春,与时间赛跑,共同创造了“西政现象”;20世纪90年代末管理体制的突然划转和改变,让学校的发展出现波折,但西政人在逆境中不屈服,不气馁、不言败,百折不挠,把困难当磨练,视危机为转机,克服各种困难和不利因素,锐意推动学校发展进步。在任何困难面前,西政人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屈的抗争精神,一种百折不回的浩然正气。这种勇于面对问题、直面挑战竞争的气魄,这种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西政人传承的优良传统,成为西政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我们偏居西南一隅,并无太多地利可言,环境条件也曾落后于不少兄弟院校。但莘莘学子正是在偏远之地祛除浮躁之气,砥砺气节情操,潜心研习学问。虽处江湖之远,反得学问之先。这亦是孕育产生光耀中国法学界的“西政现象”的重要因素。

——**和衷共济的团队情怀。**西政人之间情深义重,亲如家人。西政校友“聚成一团火,散为满天星”,他们虽散布于大江南北,但都有着同一个名字——“西政人”,有着同一份情怀,那就是“爱西政”!无论岁月流逝,无论天南海北,他们情系母校,矢志不渝。聚散离合处,西政情永存。每当母校发展的关键时刻,西政人都会发扬团结协作、和衷共济、共度难关、奋力拼搏、敢为人先的团队精神,“西政精神”就会得到令人感动的彰显,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特别是2003年,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西政在全国首批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从此我校所有的法学二级学科均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同时我校法学以外的所有学科也都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均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也是在这一年,为迎接西政校庆(当时仍以1953年西南政法学院为建校起点,故为五十年

校庆),全国各地各年级校友众志成城,在短时间内一举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五十部,形式之创新,品质之高端,赢得各界一片好评。2004年,我们在西部地区率先设立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5年,整合众多学科的力量,强强联合,集体攻关,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A级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成为重庆市第一所承担此类项目的高校。2007年,全校上下精诚团结,奋勇争先,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教育部专家对我校办学成就和办学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进一步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凝聚力。2008年,学校成为教育部和重庆市重点建设高校,再次赢得发展机遇,并且借“恢复招生三十年”的契机举办了一系列活动;2009年、2010年,我们将“转型升格”提炼为全体西政人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开启了创建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新征程。

——严谨求实的诚信校风。当年“西南革大”蕴蓄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严谨扎实的教风,在西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结为“论辩文化”和“实务教育”两个鲜明的办学特色。其源于学校特殊的建校背景,在学校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又融入了现代教育观念。它看似两个方向,实则高度统一:尚思善辩,才能目光高远;厚德笃行,才能脚踏实地。尚思,但不空谈;笃行,但不功利。这两大特色紧密联系,共同体现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独特教育模式,也是“西政人”的一个标签。“严谨求实、知行合一”,成为是西政的教学特色,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学校历来将以“务实”为基点的学生思想素质教育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任务。在改革大潮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学校秉承“务实”的学术传统,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密切结合,将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社会适应能力强的“务实创新”型高素质专门人才作为育人目标。学校地处西南,偏居一隅的地缘劣势却辩证地造就了一方学术净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云:“主忠信,行笃敬。”正是厚德、尚思、笃行的理念,培育了西政人严谨诚信、厚积薄发的学术精神和做人风格。

此次隆重推出的这套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系列文库,正是上述“西政精神”的再一次体现。这种精神,很多人追寻过,希望论证清楚、阐释明白,然而,只有真正拥抱过这片土地和被西政拥抱过的人,才能真

正体悟。“西政精神”——在每一个爱西政的人心中。

总结历史的意义,既在于反思过去,更在于指引未来。

今日的西政人,正走在“第三次创业”的大道上,承继西南革大传统,弘扬“西政精神”,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六十周年纪念,标志着西政历史的首卷已然浓墨重彩,同时意味着一轴新卷正徐徐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政人所拥有的,不仅是六十年无比辉煌的历史让我们自豪;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期待并等待我们描绘!

西政雄风犹在!

是为序。

付子堂

2010年7月31日

于重庆歌乐山下

序言：学法三十载

一、从江海平原到巴蜀大地

1980年8月我接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自然是兴奋非常，自己整整一年在我们如东县马塘中学所设的大学考试补习班的苦读总算修成正果。我的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据说是当年如东县马塘中学收到的第一个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的老师们也都格外地为我感到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要非常感谢我们如东县的教育当局，当时有那样大的魄力和智慧，在县里的最优秀的中学之一马塘中学开设高考补习班，录取上一年高考落榜者中的优秀者进行专门的补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初中有几年是在我们当时的双甸公社农业中学度过的，那里无文化可学，天天主要是学习运用农业机械和如何种庄稼。因而，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的文化知识是很薄弱的。多谢我的伯伯徐广德“文革”快结束前从江西赣州调回如东担任我们双甸镇的镇长，我才得以从农业中学转学到镇上的双甸中学插班学习。由于我的数理化基础太差，我被分到文科班学习，并准备高考。尽管我利用在双中的两年时间补习了很多课程，也全身心地投入高考复习，但终因我

的学业基础差,1979年的高考毫无悬念地失利。就在我为前途彷徨时,一天我们家的有线广播中突然播出了县教育局的一个通知,让大学落榜的一些考生去县里在马塘中学开办的高考补习班报到。我的名字竟然也在其中。从这一刻起我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补习班集中了经验丰富的老师讲课,且补习生也算是全县“矮子中的高子”,加之上一年的成功办班的经验,我们这第二届补习班高考入学率相当高。我更有幸成为其中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而且录取我的学校还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全国重点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

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是非常新奇和惶恐的。对于之前仅去过几十公里之外的小城镇的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来说,他一定是特别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的,更何况我要去求学的地方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重庆。但是,没有出远门的经历,多少也让我有一些恐惧感,不知道如何能够平安顺利地抵达目的地。我的一个邻居正好要去上海办事,我就肩挑一个樟木箱和被子与脸盆等日用品和他一起搭公共汽车先到南通,再转轮船去上海。那幅景象无异于当下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上海我再搭火车经过两天多的行程终于到达重庆。西南政法学院在重庆火车站设了迎接新生的接待处。我和其他一些新生被学校的一辆大巴接走。我顺利地迈出了三十年学法之路的第一小步。

二、歌乐山下的日子

西南政法学院地处重庆沙坪坝区,在美丽的歌乐山下,紧邻着的便是著名的重庆烈士墓和中美合作所纪念馆。我入学的那一年,是学院“文革”后恢复招生第三年,在校学生有78级(法律系和师资班)和79级(法律专业和刑侦专业)。我被分在法律系80级1班。全班有43名同学,分别来自四川(当时重庆尚行政隶属于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自治区)。和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四年朝夕相处,我不知不觉地抛开了家乡的小地方气,而对不同区域的人及其文化、习俗敞开胸怀,这多少是我人生的一次升华。

1980年的西南政法学院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除了一栋既有的东山大楼还较为像样外，其他为数本来就不多的建筑要么破烂，要么才刚完工启用，图书馆和阅览室则设在临时用毛竹等搭起来的平房中。校园的道路不少都是简单的泥土路，每逢下雨，土路就又烂又滑，烂红土沾满鞋子，非套鞋而无法行走。本来我就没有见到过好的大学校园，没有比较，所以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感到怎样的诧异。相反，由于校园和我们家乡的农村有些许相似，反倒觉得亲切，身在其中，倒少了些思乡的情绪。

大学的第一、二学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阅读小说和诗歌等文学著作和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和美学著作上。那段日子，能够沉浸在我感兴趣和喜欢的书籍中，身心得到洗礼，心灵得到净化。我曾完整地读过一遍黑格尔的《小逻辑》、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理解这些著作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尽量地从中汲取精华。当时看过的小说中现在尚存较深刻印象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历史书籍我也找了一些来看，如《三国志》。和当时不少大学生一样，我那时对诗歌也非常感兴趣，经常读《诗刊》上的诗，并且还试着创作了几首诗歌。

在法律专业课程方面，我对法律逻辑学很感兴趣，学得非常起劲，成绩也不错。民法、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也是我颇为喜欢的专业课程。也正因如此，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选题便是横跨这两个课程的论题——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比较。顺便说一下，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已故外国法制史专家林向榕教授。他对我的这篇文章的指导非常认真，仅为了文章语言的修改，我就反复到他家去了不下四次，直到他最后认为文章内容和语言都可以为止。所以，后来这篇文章才得以顺利在《法国研究》杂志发表。我对刑事方面的课程以及经济法课程不是很感兴趣，我总是认为前者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付弱小的个人的法则，因而没有民法体现的那种平等精神；而经济法则过于空洞，除了将民法的一些原理套在所谓的经济活动上，别的就没有自己的内容。我非常想学的是国际法方面的课程，基本上在第三学年就确定要考国际私法的研究生，并且把目标确定为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因为那里的国际私法是国内最好最强的。但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国际私法课是放在第

四学年开,而研究生的考试是这一年的年中,所以,我是跟着79级上的国际私法课。实际上从第三学年开始我的主要精力便放在学习准备研究生考试上,另外还需应付正常的课程。

四年的大学学习我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学习。基本上是每天一早起来跑步锻炼后就背着书包,拿着饭碗,找一个清静处背英语单词,读英语课文。刚改革开放,当时学习英文的条件相当有限,好在学校图书馆里还有若干份外文的专业期刊,我于是经常去那儿读外文期刊,久而久之和阅览室的那位头发全白的管理员老先生处得很熟,他允许我将老期刊借出去阅读。我当时最爱读的一本英文杂志是美国的《侦探》,它故事情节悬疑,英文也相对简易。我还曾和我们79级的南通同乡徐清宇一起翻译过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对英语学习兴趣也非常浓厚。尽管我对刑法学的学习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很喜欢伍柳村老师的刑法总论的讲课风格,觉得他才是我心目中的大学教授,尽管他当时年岁应该在六十开外,而且还仅是一名讲师。由于喜欢伍老师,我就将我并不喜欢的刑法和英语学习结合起来,找来一篇英文的刑法论文阅读和翻译。这是一篇研究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刑法思想的文章。中文翻译好后,我约上同年级三班的江苏老乡张晓明一起去伍老师家,把翻译好的中文稿请他帮我看看。和我不同,晓明对刑法很感兴趣,也很喜欢伍老师。伍老师看完我的译稿后觉得不错,还帮我做了一些语言方面的修改,建议我投稿给杂志发表。这篇译文应该是我学习法律后的第一篇专业创作,对自信心的建立以及学术兴趣的培养无疑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我大学四年的短期目标就是考研究生,而且是考我感兴趣的国际法研究生。第四学年的考研复习是紧张的。我记得考前几个月除了回宿舍睡觉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东山大楼的教室复习。复习是枯燥和孤独的,我当时甚至学会了吸烟减压。我们班和我这样紧张复习考研的还有范忠信同学,他比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生考试前竟然一只眼肿胀得很厉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班。

三、东湖岸边、珞珈山下的美好时光

武汉大学坐落在武汉珞珈山下东湖之畔,校园之美丽据说应是全国大学中首屈一指的。1984年7月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典礼之后,我和一帮也考取武汉大学研究生的同学以及顺路到武汉的同学一起乘江轮从重庆沿江而下到武汉,他们中有和我一样考取武大国际法研究生班的蔡镇顺、考取武大刑法专业研究生的王志军以及回老家探亲的张新宝。从重庆到武汉和我四年前由上海去重庆的情况是截然不同了,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不但学到了不少书本知识,更是学会了如何融入大学那样的大家庭,也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如何去探寻,再也没有了恐惧和陌生,而是增添了不少的自信和胆识。

到武汉大学报到后的第一个晚上,韩德培老师在李双元老师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的宿舍看望我们国际法专业新入学的研究生,韩老先生当时已经73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李老师向韩老先生介绍我曾专门研究过《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民法基础不错。后来我慢慢知道,武汉大学法学院尽管以国际法见长,但是以韩老师和李老师为首的国际法教授们恰恰非常强调学生们的民法学基础。

研究生阶段的课程都是我感兴趣的。我除了认真地学好学院为我们开设的每门课程外,还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在英语学习上。我除了阅读外文的专业书籍外,还尝试着翻译专业论文和专著。我独立翻译了一本名为《民法的起源与演变》的专著。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1988年12月时中文打字机打出的打印本。本来当时想认真校订后交给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1988年1月我出国留学,便搁置了翻译书出版的准备工作。多谢李双元老师在我出国后还安排将该书稿打印出来,所以才有上述书稿打印稿留存至今。这尽管是一本篇幅不大的专著,但是由于涉及罗马法和外国法制史的内容,翻译起来并不那么简单,翻译工作对我专业英文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武汉大学法学院当时尽管有一些外文藏书,但数量也相当有限,而且

大多相当老旧。在外文专业图书方面,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的藏书还是相当丰富的。为了满足研究生对外文专业著作的需求,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派我去西南政法学院复印一批外文图书。西政图书馆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得以复印了几十本外文专业专著,并装订成册,运到武汉大学法学院。至今武大法学院图书馆里还有我在西政复印的这些图书。通过这一工作我对西方国际法专业文献有了概括性的了解,这对我后来的专业学习和研究颇有裨益。

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生都归属于国际法研究所。我在读时,国际法研究所汇集了一批年富力强非常富有创造力的青年国际法学者,他们包括现在活跃于国内法坛的优秀法学家,如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副总领事、现唐山市副市长黄惠康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国际经济法教授余劲松等。我很喜欢和这些师兄们进行交往,向他们学习,从他们那里取经,并且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1985年国际法研究所发起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青年国际法学者研讨会,我参加了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并且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该研讨会聚集了当时全国各大法律院校的青年国际法学者,如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时便是该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与会的青年国际法学者不但通过专业交流提高了国际法的学术水平,该研讨会还在全国青年国际法学者间建立了友谊。我参加了前三届的这一全国性的研讨会,直到我后来出国留学。据说,后来这一当时在国际法学界颇有影响的研讨会未能继续下去,实在是可惜。

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刘道玉教授。刘校长既是一位有思想和教育创新意识的校长,又是一位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长辈。他对国际法研究生非常关心,尤其是特别关心他们的外语学习。我还记得,我们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为了能够使学校为每人配备一台供外语学习用的收录机,还派代表去校长办公室反映情况,请刘校长帮助我们解决该问题,我也是代表之一。刘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耐心听完我们的汇报。几天后,我们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每人分得一台在当时颇为新潮的收录机,这为我们外语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在研究生学习的头两年,我还是将法律专业的重点放在国际私法上。这一门课由李双元老师和项克涵老师分别主讲,他们两位老师都非常认真地备课,讲授得也非常深入。项老师在国外留学过,英语很好,所以讲课运用资料非常丰富。只可惜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后来因病早逝。我和李双元老师非常谈得来,因此,常常到他家里做客,李师母则是经常留我吃饭。李老师除指导我学习国际私法外,更鼓励我研习民法。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和李老师马上一一起写了关于该法的系列述评文章在杂志连续发表。

1985年于中国国际私法学界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度。这一年夏天由武汉大学法律系和贵州大学法律系联合在贵阳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国际私法研讨会,其后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城市召开一次这样的国际私法学术年会。作为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私法研究生,我有幸直接参与了这一次会议的筹备,并且与会,且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关于运用系统论研究国际私法的论文。该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在《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几年后,该文章的观点还很荣幸地被法国著名国际私法学家拉加德教授在法国 *Clunet* 杂志向世界介绍。参与筹备和组织此次会议的经历对我组织能力的锻炼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对我后来学术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直到现在那次会议的与会者还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6年我被法学院推荐破格参加当年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招考,并顺利通过博士生招生考试,被录取为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成为继我国第一位国际私法博士研究生黄进之后第二批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国际私法学术泰斗韩德培教授。我们这一批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有三位,另外两位是张明杰和周海荣,但是,我是唯一的一位在职的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双元老师作为国际私法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还具体负责我们几个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由于当时博士生人数很少,老师们将很多精力花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上,我们有机会和老师们就专业学术问题进行充分深入的沟通和探讨。我将私法国际统一问题作为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我当时认为尽管中国对外开放时间还不长,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国策,对外开放的结果必然是中国愈来愈紧密

地融入国际社会。从私法的发展趋势看,在保持冲突法作为解决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途径的情况下,各国势必会努力通过进行私法的国际统一工作以谋求国际社会私法制度的逐渐统一,从而便利国际民商事交往。因此,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研究和探索私法国际统一,于我国对外开放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而言,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的这一选题得到韩德培老师和李双元老师的肯定和鼓励。选题确定后,我便围绕它进行资料收集和初步研究,并草拟出博士论文的大纲。我确定的写作思路是,分章节独立研究,独立成文,合适时作为论文发表,合而则成为一本有关国际统一私法的专著。其后至今几近 25 年时间,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尽管有若干这一论题的论文发表,但是,专著至今也还未完稿付梓。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出国留学进修蔚然成风。1987 年时我被武汉大学法学院推荐申报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计划。富布赖特基金会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基金会,其奖学金获得者享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前景。就在我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的同时,我被通知获得了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范·卡尔克奖学金。这是一个资助学术研究的短期奖学金,我决定利用该机会去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收集我上述博士论文方面的资料,并在结束瑞士短期逗留后回国利用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

1987 年年底我离开珞珈山去瑞士,在武汉大学学习和生活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时间虽短,但是,这是我人生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我在这里开阔了学术视野,踏入了法学的学术殿堂。我在东湖岸边、珞珈山下享受了最美好时光,还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后来一直陪伴我至今的夫人梅琼女士,在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欣赏东湖的泛舟和珞珈山的落日。

1997 年 12 月我从武汉去北京申请瑞士签证,一旦签证下来就从北京出发赴瑞士,因为这时我已经先拿到了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给我寄来的瑞航北京到瑞士的机票。这时正值北京隆冬,我借宿在当时外经贸部位于昌平的培训学院,并有机会和研究生时的同学郑泉等在京工作的几位朋友溜冰玩耍,好不快乐开心地玩了差不多一个月。